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朗宇法师

清修法师

主编

台湾佛教史论

阚正宗 著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主 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
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



台湾佛教史论

阚正宗 著

◎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台湾佛教史论

阙正宗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湾佛教史论/闾正宗著. 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8

(宝庆讲寺丛书·中国佛教学者文集/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主编)

ISBN 978 - 7 - 80254 - 004 - 0

I. 台… II. 闾… III. 佛教史 - 台湾省 - 明清时代 ~ 现代 IV. 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054470 号

台湾佛教史论

闾正宗 著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1(编辑部)

策划组稿: 黄夏年

责任编辑: 张伟达

版式设计: 陶 静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20 千字

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800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54 - 004 - 0

定 价: 38.00 元

总 序

从佛法本身来说,教、理、行、证的修学次第,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。但是,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、喜好的不同,往往有所偏向,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,有重义理、重实践等区别。但是,作为佛弟子来说,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,充分、完整地表达出来,如“阿毗达摩”虽然着重于论证“法”的自性、定义、关系等,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“谛理的现观”,最终归于修证。那么,重修证的佛教,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,重视佛法的适应性、实效性,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,如初期大乘经典以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、“解脱门”、“陀罗尼”、“菩提心”等作为中心,来表达从发趣、修行到证入的历程。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,但都是佛法的根本,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。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,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,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。《高僧传》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,其中翻译、解义、读诵便属于义解门;而习





禅、明律、感通、遗身、护法、兴福，都是属于实践门；最后一科“杂科”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，旁及世间经书、治世语言、礼乐文章等，无不兼通。

但是，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，主要是注疏经、律、论，在“述而不作”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，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。而且，这些佛教义解僧，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，通过注疏、论著，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。南北朝佛教的兴盛、隋唐佛教的辉煌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，重视主体的体认、自己身心的解脱，净土法门的流行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，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随着禅、净的流行，在这种“简单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潮流下，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、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。于是，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。

另一方面，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，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，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，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。于是，通过接触梵文、巴利文等东方语言，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，消化佛教的教义。在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主义”思想的影响下，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

观性、纯学术性，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，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——佛学。19世纪后期，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，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。随着“西学东渐”、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，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，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，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的辨伪，“大乘佛教非佛说”的讨论，“佛教非宗教非哲学”之辩等。同时，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，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“人生佛教”运动，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，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。但是，相对来说，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，像吕澂、陈垣、汤用彤等，皆为一代学术大师。


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，经过二十年的努力，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、重塑佛像的工作，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、香火旺盛的现象。于是，培养人才、弘法、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。然而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。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，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，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



气的影响,文献学、考据学、思想史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,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,定性定量,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。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,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,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,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,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,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,显示其优胜之处。通过学术研究,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,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。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,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,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;同时,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,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,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。

因此,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,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,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、文物中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探索其前后延续,彼此关联的因果性;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,及其因时、因地的适应。以了解过去,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,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“人间佛教”思想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“以文化阐扬佛法,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

要组成部分,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、本土化、现代化的权巧方便。”现代中国佛教界,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,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,通过转化与变通,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,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。

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(989),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嘉定十五年(1222)宋宁宗赐名“宝庆讲寺”。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、尊重学术、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,一直讲法不辍。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,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《宝庆讲寺记》。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《宝庆寺观音殿记》。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,高高地耸立在寺里。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,在日常事务、早晚功课、坐禅念佛等之外,勤于读书,研究经论。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,参访名山大寺,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,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。因此无论到哪里,我都会带上一些书,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,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,蔚为大观,感到欣慰。但是,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,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,而且现有书籍之中,难免良莠不齐,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。有



感于此,我和道坚法师、圣凯法师、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,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。于是,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,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,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,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。



朗 宇

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

序 一

侯坤宏

认识正宗兄，是透过他的书；与正宗兄正式交往，则是近几年的事。其后曾和他一起口述访问过一些当代台湾佛门人物，也因此对他的为学与做人，多了一些了解。正宗兄除在《菩提长青》杂志常年发表一系列有关佛寺专访文章，后来陆续结集出版9本“台湾佛寺导游系列丛书”外，近年来勤于笔耕，不断有新作问世，如《台湾佛教一百年》、《重读台湾佛教——战后台湾佛教》（正、续编）、《台湾佛寺的信仰与文化》等书。月前正宗兄来电表示，要我为他这本新书写篇序，其实就台湾佛教史领域言，正宗兄算是我的前辈。所以以下也只能以随喜心情，谈谈一些个人的读后感想。



序
一



正宗兄这本新书所搜录的文章,包括通论与清代、日据时期,以及战后人物、史料等三部分,其中第一部分搜录文章三篇,第二部分搜录文章七篇,第三部分搜录文章六篇,另附录一篇。以下谨就个人阅读后归纳的几个问题略加叙述如下,以供读者参考,不当之处,尚请正宗兄及各位读者见谅。

一、关于台湾佛教史料问题。研究清代台湾佛教的发展,主要必须依赖官方档案;而日据时期,台湾佛教的发展,除了正式的总督府的文书(可参温国良译自台湾文献馆典藏的台湾总督府档案《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法规史料汇编》系列丛书)之外,由官方主导的期刊,如《南瀛佛教》、《台湾佛教》是研究日据时期台湾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。而日据时期无论官方或民间所发行的报纸,也不能错过,如《台湾日日新报》。另外,日据时期日本佛教各宗的布教资料,如曹洞宗的《宗报》,临济寺机关报《圆通》等,也是研究者应该留意的。日据时期有两本重要的寺院调查报告:《台湾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》(徐寿于昭和七年发行)与《台湾佛教名迹宝鉴》(施德昌于昭和十六年发行),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日据时期的寺院发展现况,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战后台湾佛教的研究,在史料运用上,基本上虽有来自官方的文献史料,但由于内容深、广度均不足,

所以运用者不多。战后台湾佛教，由于有些教团为争取“人间佛教”的解释权与发言权，教团领导人常透过出版个人传记，为自己及宗派“定位”，这些传记未来还得接受历史检验。研究战后台湾佛教，不同于清代或日据时期，并非因为缺乏资料，而是史料特别众多、庞杂，因此在运用上有其难度。除了期刊、传记外，纪念集、年谱、回忆录、追思录、日记、同戒录、讲经集、特刊、寺志、沿革志、当代学者的研究与研究所毕业论文，都是研究台湾佛教不可或缺的资料。虽然种类多，但只要用心收集，并不太难，研究者若能配合田野调查、口述访问，日久自会累积成果。（见《战后台湾佛教史料的查找与运用》、《关于台湾佛教寺院调查之出版概论》）



二、关于台湾佛教内在本质问题。书中所录《台湾佛教概论》乙文，可以视为本书的导论。正宗兄在文中说，明郑以降的台湾佛教有三种：一是僧侣只知早晚课诵，带有农禅遗风、禅净双修的“传统佛教”；二是变胎自禅宗，并杂糅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思想的斋教（斋教又分龙华、先天、金幢三派，其中以龙华派为大宗）；三是属于庶民信仰、佛道不分的“民间佛教”。此种将台湾佛教归纳为传统佛教、斋教与民间佛教的方式，虽然还有讨论的空间，却仍有助于学者进一步研究讨论之用。所谓“民间佛教”是指其外表看似佛教，



但实质上是杂糅浓厚的民间神祇崇拜,如将观音菩萨称为“观音佛祖”。台湾许多寺庙主要供奉观音,另夹杂关公、妈祖、玉皇大帝、三太子、注生娘娘、文昌帝君等众多神祇。民间佛教以追求灵验、感应为主,和传统佛教不同,但是民间佛教自清代以降至今仍然存在,影响力很大。又,在《清代台湾府、县僧侣的活动》乙文,正宗兄指出,清初台湾的佛教界,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来台住持现成的寺庙官观,而非自行创建,在台湾佛寺少、官观多的情况下,僧人住在妈祖宫、关帝庙的情形是可以理解的。由僧人住在妈祖宫、关帝庙的情形,也可以得知,台湾佛教与民间信仰相交兼容其来有因。研究者若能由此契入,当更能掌握当代台湾佛教的本质。

三、殖民主义性格佛教与台湾佛教山派崛起问题。日本佛教自甲午战争就开始了其近代“从军僧”历史,各教团积极投入,从“九一八事变”、“七七事变”到太平洋战争的“十五年战争期”,在许多军事动员场合,皆可看到僧侣的活动。日据时期日本佛教在台布教史,略可分为:殖民初期(1895 - 1905)、殖民中期(1906 - 1930)、殖民后期(1931 - 1945)。殖民初期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发展彼此摸索结盟时期,无论是佛教宗派还是民间信仰,自由加入、退出的情况非常普遍。殖民中期,可以基隆月眉山灵泉寺申请加入日

本曹洞派为指针，台湾佛教四大法脉相继崛起。殖民后期，皇国佛教化的力道不断增强，台籍僧侣被动或主动走向改造之途。殖民政策以养成当地住民成为“天皇赤子”为目标，特别是1930年后半至1940年前半，高喊“皇民化”体制下，殖民地人民面临改造。（见《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佛教僧侣在战争时期的角色》）

据正宗兄研究，日据初期日本佛教各宗，无论是布教师或慰问使，除肩负在军传教、慰问角色外，同时还有对征服地住民的传教。但因日本来台布教师、开教使良莠不齐，加上语言隔阂，使得其布教对象多集中在日本人身。直到明治末、大正初年，以曹洞宗、临济宗为主的两大宗派，采取和本岛较具影响力的台湾僧侣及寺院结盟，才开启了日本佛教在台布教的新页，如崛起于日据时期，到战后台湾仍深具影响力的台湾佛教四大法脉（或说五大），其中基隆月眉山灵泉寺、苗栗大湖法云寺，就加入日本曹洞宗；五股观音山凌云寺、台南开元寺、高雄大岗山超峰寺则加入日本临济宗。（见《从“从军僧”到“台湾开教使”——日据初期（1895-1912）佛教各宗的台湾布教》）

关于台湾山派崛起问题，可以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为代表。灵泉寺在善慧和尚领导下，一方面保留来自祖庭的传统，一方面又与日本佛教宗派保持良好关系，在左右逢源之下渐次壮大。抗日战争爆发初期，





善慧和尚曾任“杭州佛教会会长”，这是日本在沦陷区的“以华制华”手段之一。早在战争爆发前，善慧和尚就与太虚与圆瑛有不错的交情。善慧和尚是在1938年回台湾，翌年8月，受上海曹洞宗长德院院主成田芳禅师招聘，由基隆前往上海，在杭州灵隐寺、净慈寺，苏州报恩寺、虎丘寺，镇江金山寺，南京毗卢寺等寺院宣抚布教。善慧和尚根植台湾，不与日本当局合作，断无发展可能。但他受日本扶植，也要为日本当局服务。善慧和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角色，很值得进一步研究。（见《日本殖民时代基隆月眉山灵泉寺的崛起》）不仅是善慧和尚，日据时期四大法脉与日本当局的关系，也都有待研究者更清楚的厘清。

又，日本佛教各宗除在台布教外，也以台湾为跳板，进军福建弘法，如临济宗妙心寺派，在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、民政长官后藤新平鼓励、资助下，临济宗、真宗僧侣就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，最终还酿成真宗厦门东本愿寺僧侣高松誓纵火焚毁布教所“厦门事件”。（见《殖民初期日僧来台转赴福建的活动——以临济宗与真宗东本愿寺的“厦门事件”为例》）

四、殖民后期日本临济宗在台布教与东海宜诚再评价问题。日本殖民后期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台布教也值得留意。昭和七年（1932）3月，临济宗第七代在台最高布教监督钝外绍俊任满回日，第八任布教总监

高林玄宝(1875-1961)在同年3月来台就任。随即展开他上任后在台布教监督巡教,并由数位随行者记录了《布教监督初巡视日志》,读者可以由此得知当时日本在台开教、联络寺庙人、事、物相关情况,从其中也可以看到东海宜诚(1892-1989)的活动。(见《殖民后期日本临济宗的在台布教——以第八任总监高林玄宝的〈布教监督巡教日志〉为中心》)关于东海宜诚在南台湾的布教事业,已有江灿腾、释慧严、王见川、胎中千鹤等学者做过研究,一般评价,东海宜诚在南台湾联络寺庙所扮演的角色,都以负面居多,主要认为他有“觊觎”寺产野心,但是这种看法值得商榷。因临济宗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台寺庙面临的“寺庙整理运动”中,东海宜诚曾大力抢救、保护了临济宗派下的联络寺庙、斋堂,使其免于被废,所以正宗兄认为东海宜诚的角色还值得再研究。东海宜诚会说台湾话,茹素不婚,谨守佛教传统僧人戒律,和日据时期大部分日僧不同。战后,他曾九度来台,与台湾佛寺、斋堂等维持良好的关系。(见《私利、宗派利益还是殖民主义——东海宜诚在南台联络寺庙结成的角色再评价》)

五、战后日人留下寺院产权问题。本书所录《真言宗弘法寺与台北天后宫——〈阅读台北天后宫〉内容的商榷》,是针对台北大学地政学系硕士生王美文所写《阅读台北天后宫》一书不足处之补充与商榷。

